

山西
财经
大学
学术
文库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文化传播与文学生长：

(1918—1923)《时事新报·学灯》研究

张黎敏◎著

〔山西财经大学学术文库〕



文化传播与文学生长：
(1918—1923)《时事新报·学灯》研究

张黎敏◎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传播与文学生长: (1918—1923)《时事新报·学灯》研究 / 张黎敏著. —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4.4

(山西财经大学学术文库)

ISBN 978 - 7 - 5095 - 5273 - 5

I. ①文… II. ①张… III. ①报纸—副刊—新闻事业史—中国—民国
IV. ①G219.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5545 号

责任编辑: 雷 婷

责任校对: 周秀荣

封面设计: 张立娟

版式设计: 兰 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ckfz.cfeph.cn>

E-mail: ckfz@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142

发行处电话: 010 - 88190406 财经书店电话: 010 - 64033436

北京厚诚则铭印刷科技有限公司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6 开 17 印张 279 000 字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36.00 元

ISBN 978 - 7 - 5095 - 5273 - 5 / G · 0137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本社质量投诉电话: 010 - 88190744

打击盗版举报热线: 010 - 88190492、QQ: 634579818

总 序

何谓大学？囊括大典，网罗众学之学府也。大学既是教育机关，也是研究机关。它不仅要传授已有的知识，并且要产生新的知识。办好一所大学，关键在于抓好“五学”，即学科、学术、学者、学生、学风。其中，学科是龙头，它规定了学校发展的资源禀赋，决定了学校建设的质量和空间，而学科建设的关键在于培育一个共生共长、良性运转的学科生态系统。

山西财经大学作为一所多科性财经类大学，确立了“以生态规划布局、以布局凸显优势，以优势凝练方向、以方向组建团队，以团队配置资源、以资源优化生态”的学科建设发展思路，通过挖掘自身的学科优势与特色，准确定位，合理布局，促进学科间的交叉互融、共生共长，努力培育和营造出一个能良性运转和可持续发展的学科生态。

一、以生态规划布局、以布局凸显优势

学科生态这个概念是借助生态学的概念来阐释学科布局的，是指在学科布局上需要注意学科的学术特征和发展习性，将有发展优势的同类学科集聚为学科群落，并带动对优势学科发展起支撑作用的相关学科，构建起交叉互融、共生共长的学科有机体。这就要求我们在学科结构布局上求优，不唯全，扬优扶重，顺势而为，准确捕捉学科发展机遇。

因此，我校建设以经济学、管理学、法学为学科高地，进一步明确了重点学科、重点专业、重点创新平台，以及各个支撑学科与主干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构建具有财经特色的学科生态。这样的布局不仅利于凸显我校学科特色，拓展我校和省内兄弟院校差异化竞争的发展空间，还有利于凸显我校的办学特色，提升财经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加强服务地方经济建设能力。

二、以优势凝练方向，以方向组建团队

学科研究方向是体现学科优势的落脚点。在学科发展方向的选择上突出建

设重点，注重另辟蹊径，在学习他校成功经验的同时，加强消化、吸收、内化，务求通过创新形成突破，努力形成自身学科优势与特色。有了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能否真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学科优势，关键在于学科团队。因此，学校特别重视学科团队建设，将其作为学科建设的主要工作来抓，长期坚持“引进与培养”并重的原则，稳步提升人才队伍的科研素养、学缘结构以及团队协作能力。

三、以团队配置资源，以资源优化生态

有了稳定的学科研究方向和高水平的学科研究团队，就具备了构建良好学科生态的硬件条件，想要收到预期的建设成效，还应合理配置学科资源，优化学科建设外环境。为此，学校将学科建设视为“一把手”工程来抓，通过成立学科群工作组，出台学科建设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启动中青年骨干教师提升工程等一系列措施进一步理顺学科管理机制，赋予学科工作组和学科带头人相应人、财、物的调动和支配权，促进学科团队成长和学科资源合理配置。

大学既是教书育人的圣地，又是科学研究的净土；既是社会进步引领者，又是社会发展助推器。我校办学历史悠久、财经特色鲜明，为山西乃至全国输出了大量高水平优秀人才，为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建设不遗余力。面对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学校确定了由教学型大学向教学研究型大学转型的发展战略，坚持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之路。组织出版《山西财经大学学术文库》不仅是对学校60多年学术文化和学术传统的历史性继承，也是学校在战略发展阶段所采取的重要举措。

本套学术文库是我校骨干教师的代表性学术成果，凝聚了作者们多年的研究心血，体现了我校的研究特色和学科优势。我们希望以此为契机，秉承“修德立信、博学求真”的校训，弘扬“明礼诚信、艰苦创业”的晋商精神，促进学校学科建设水平再上一个新台阶。

校长：邵泽光

2013年12月

目 录

导论

1

- 第一节 研究缘由与研究意义 1
- 第二节 学术回顾与研究现状 4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基本构架 6

第一章 《学灯》：文化传播网络之建构

14

- 第一节 建构文化传播网络之动因 15
- 第二节 《学灯》：中立、稳健的文化传播立场 26

第二章 教育传播与问题意识

31

- 第一节 根本之救治之策，唯教育事业是赖 32
- 第二节 对新文化主流阵营的拥护和响应 37
- 第三节 力主改革，承前启后：《学灯》的栏目创新 56

第三章 思想实验与新诗传播

61

- 第一节 《少年中国》与《学灯》的双向建构 62
- 第二节 作为《学灯》的作者：由哲学而入文学 76
- 第三节 郭沫若在诗坛上的合法崛起 81
- 第四节 品牌意识，职业境界 102

第四章 主编理念与学术传播

119

- 第一节 编辑理念：以学术传播为宗旨 121

CONTENTS

第二节 研究型的编辑风格	122
第三节 新文艺的差别待遇	141

第五章 文艺阵地与大众传播

157

第一节 文化启蒙的理想诉求： 郑振铎主编《学灯》之缘由	159
第二节 文艺阵地的营建	166
第三节 价值重估与文学自由	186
第四节 《文学旬刊》与《时事新报》、《学灯》	192

结语：学人、学术与《学灯》

202

附录	209
参考文献	253
后记	265

导 论

第一节 研究缘由与研究意义

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在研究现代文学作家作品、文学流派等传统领域的同时，越来越注重对文学生态的研究，即对现代文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文化语境的研究。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报纸副刊的研究被纳入现代文学研究界的视野中。

1946年，沈从文为天津《益世报》编《文学周刊》，他在《编者言》里说：“在中国报业史上，副刊原有它的光荣时代，即从五四到北伐。北京的‘晨副’和‘京副’，上海的‘觉悟’和‘学灯’，当时用一个综合性方式和读者对面，实支配了全国知识分子的兴味和信仰。国际第一流学者罗素、杜威、太戈尔、爱因斯坦的学术讲演或思想介绍，国内第一流学者梁启超、胡适之、丁文江等等重要论著或争辩，是由副刊来刊载和读者对面的。南北知名作家如鲁迅、冰心、徐志摩、叶绍钧、沈雁冰、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玄庐、大白……等人的创作，因从副刊登载、转载，而引起读者普遍的注意，并刺激了后来者。新作家的出头露面，自由竞争，更必须由副刊找机会。”其结论是：“报纸副刊直接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磐石永固。”^①可见，报纸副刊在现代文学建设方面曾经产生过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是，对于报纸副刊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学生产方式，在新文学史著作中却鲜有系统的论述。20世纪80年代末，著名作家萧乾在《中国报纸的副刊·序言》

^①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47—448页。

中曾经感喟：“遍翻几部现代中国文学史，看不到哪位文学史家正视过文学副刊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起过的作用，作出的贡献。然而多少作家是在20年代、30年代，在北平的《晨报》、《京报》，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上海的《申报》和《新闻报》开始写作的呀！”^①正如孙玉石教授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笔会上所指出的：“近年来，作现代文学研究的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报纸文艺副刊资源的开发与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突围以及学风改变之间的关系。现代报纸文艺副刊蕴藏了相当丰富的文学文献资源。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未得到全部、完整的开发，没有充分地进入现代文学史的记忆和写作。”^②因此，应该说，报纸副刊研究是在某种程度上填补现行现代文学史的叙述格局。

本书选择《时事新报》副刊《学灯》这样一种新文学的生产方式作为个案研究，缘由即在于此。

《学灯》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四大著名报纸副刊之一。^③在新文化运动中，《学灯》责无旁贷地继承了《新青年》所开创的启蒙之旅。短短几年时间，无论是对现代思想、文化的传播，还是对新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了较大的作用。但是，笔者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梳理，认为目前学界对《学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闻立场上的概括和介绍，迄今为止还没有论者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现象进行全面的研究和探讨，颇为遗憾。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三点：其一，收藏《学灯》的机构在全国寥寥无几。目前所知，可以查阅《学灯》原刊的高校中，保存资料较为完整的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和清华大学图书馆。这对于研究者来说非常难得，在这里可以较为完整地考察其全貌。此外，上海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这两处收藏机构只能看到《学灯》的缩微胶片（没有影印本）。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收藏地域的有限分布缩小了研究者的范围。其二，对《学灯》的研究，大部分学者仅满足和认同于以往有关《学灯》的结论性语言，甚至是以讹传讹，却很少有学者辨析和考证。其三，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学术文章和论著对《学灯》的价值评估有贬低的倾向，对《学

① 王文彬编：《中国报纸的副刊》，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② 孙玉石：“报纸文艺副刊与现代文学研究关系之随想”，《河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③ 笔者注：学界关于五四时期的四大副刊的说法，笔者亦认为不妥。所谓“四大副刊”，是指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北京《晨报》的《晨报副镌》，以及北京《京报》的《京报副刊》，但把《京报副刊》列为“五四时期四大副刊”之一，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它创刊于1924年12月5日，其时五四新文化早绝尘而去了。因此，如果前面有“五四时期”这类时间限制词的话，那也只能说《学灯》为三大副刊之一。本书在此还是沿用了传统之说法。

灯》的研究也存在误解。1949年前,《学灯》的声望并不低。张静庐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末所著的《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一文中就认为《学灯》曾经一度“有左右学术界的势力”^①。而1949年以后,受多方面的影响,作为研究系^②的机关刊物,《学灯》的评价却渐渐走低。由于它走的是“中间路线”,所以既不会被“左派”所赏识,同时也不被“保守主义”所包容,结果差点儿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近些年来,关于《学灯》的正面评价逐渐多了起来。遗憾的是,知识界积重难返,对它还普遍存在一种误读现象,影响了学界对它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因此,本书把《学灯》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现象进行研究,系国内第一部对《时事新报·学灯》进行全面研究的专著。

1918年3月4日《时事新报》创办副刊《学灯》,起初每周一次,星期一发刊;5月起改为每周两次,于星期一与星期四发刊,11月16日起又改为星期二与星期六发刊;11月25日改为每周三次,每星期一、三、五发刊;12月8日起,改为日刊,星期日休刊;1919年11月25日起逐日发行。1921年5月10日起,《时事新报》增辟《文学旬刊》,9月16日起,增辟《社会主义研究》旬刊,每逢这些旬刊出版,《学灯》就休刊。1925年11月,《时事新报》“教育界”栏并入《学灯》,以刊载有关教育的评论与新闻为主,不再刊登文艺著译。从1928年4月4日起,改为《学灯教育界消息》,由程晓湘主持。1929年5月16日进一步改为《教育界》,《学灯》因此终刊。

《学灯》的版式也是几度改变。最初《学灯》每期只占第三张第一版的大半版,下版是“新闻屑”一栏,1919年2月起扩充为两版。1922年1月起改为4开4版的附张,1923年4月至10月为横四开。1924年起《学灯》的第四版辟为“教育界”栏目,“学灯”的篇幅只占三版。1925年7月后更缩小为两版,11月11日起又与“教育界”合并扩充为四版。

鉴于1925年11月以后的《学灯》转变为教育类副刊,不属于本书研究的范围,故在此不列入考察范围之内。1923年8月底《学灯》主编柯一岑离去后,《学灯》的文学价值日渐丧失,又由于1924年《时事新报》主笔张东荪的辞职,《学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先锋地位日渐衰落,失去了往日的风采。基于此,本书主要对1918年3月至1923年8月之间的《学灯》展开研究。

① 张静庐:《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转引自《民国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民国丛书》(影印本)第3编41卷,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33页。

② 关于研究系前后经过,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一节。

第二节 学术回顾与研究现状

国内研究现状：

第一阶段：1949年以前的《学灯》研究

1949年以前的《学灯》研究，主要散见于报纸杂志所刊登的文章及新闻学著作中，都是零星的叙述，其基本观点一致，即《学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现举例说明之：

(1)《新人》杂志1920年第5期读者这样评价：“自从不编黑幕以来，《学灯》很贡献些常识给青年学生。五四运动发生，那手足灵活的张东荪就极力联络学界用重价报酬投稿人，于是乎《学灯》就益发生色，在学问贫乏的中国里，居然也导出几篇有系统有组织的研究学理的文字了。”^①可见，《时事新报》引起文化界的重视，主要是《学灯》的缘故。

(2)20世纪20年代末，张静庐在《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中写道：“上海的新闻纸，从事于新文化运动的，要算《时事新报》和《民国日报》。最初，上海和内地的教育界，所喜欢看的日报，莫过于上海《时报》，因为《时报》在当时，对于教育界的新闻，记载特别详细的缘故；从新文化运动以后，全国青年的思想，为之一新，《时报》的主编者，不晓得迎合时代潮流，并一张副刊都不肯出版，仍保留其《余兴》《小时报》的老套头。因此，《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应时而起，延宗白华为主编，撰述者都是一时之选，于是学界极表欢迎，《时报》十余年来在教育界里所打下的根基，不能不动摇，以至于倾坍。”^②

第二阶段：1949—1979年的《学灯》研究

此阶段对《学灯》的研究未有实质性进展。与此相反，因为受到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学灯》的文化贡献受到某种不公正待遇，因而长期处于学术的“边缘”位置。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著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对《学灯》的评价明显受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认为：“‘学灯’虽以宣传新思想闻名，实际上从开始起就属于新文化运动中的右翼，质量比‘晨报’副

① 笔者注：《新人》杂志为月刊，创刊于1920年4月，由上海的新人社出版，新人社没有明确的纲领和经常的组织活动，社员近五十人，主要分布在上海、北京、南京、江西等地，大部分是编辑、教员和学生。《新人》出七八期合刊后停刊。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409—416页。

② 张静庐：《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转引自《民国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民国丛书》（影印本）第3编41卷，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33页。

刊差得多,和‘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更不能比。愈到后期,‘学灯’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资产阶级学术气息愈为浓厚,最后蜕化出‘社会主义研究’这样的反对刊物,而它本身也就丧失了生命力,连原来的虚名也保不住了。”^①应该说,这样的评价有失公允。

第三阶段:1979年以后的《学灯》副刊研究

1979年以后,学界主要从新闻史角度研究《学灯》,如冯并的《中国文艺副刊史》就专辟一节(第五章第四节)予以介绍,对《学灯》的历史变迁、人物陵替、报学意义等作了探讨,但对于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却有所忽视^②;姚福申、管志华的《中国报纸副刊学》,是我国第一本论述报纸副刊学的专著,本书在第七章第二节对《学灯》进行了专题论述,从《时事新报》的政治背景、《学灯》的宗旨与基本内容和《学灯》的历史变化三方面阐述,评价较为客观,但限于篇幅不能展开论述,仅是《学灯》的概貌展现。^③

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很长时间鲜有人提及“学灯”二字,更遑论把研究的探索触角对准尘封已久的《学灯》。因此,朱寿桐先生发表于《新文学史料》2005年第3期的《“学灯”与新文艺建设》就更显得弥足珍贵。文中他对《学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以倡导新文化而闻名的《时事新报·学灯》,在20世纪前20年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和传播力,特别是其推出郭沫若的系列新诗以及日后以《女神》命名的新诗集。值得欣慰的是,随着学术界对报刊文化与传播研究的深入,《学灯》再一次撩拨了学人们心中蛰伏已久的学术热情,近五年来就不乏有一些新的研究、探索和新的收获陆续问世。比如王吉鹏、郭磊的《鲁迅与〈时事新报·学灯〉》,文章梳理了鲁迅与《学灯》的关系,并进一步指出现代传媒与现代知识分子互动的因素^④;又如,吴静的《〈学灯〉编辑群在五四新诗传播中的贡献与意义》^⑤和《传承与建设:〈学灯〉编辑群与五四新文学》^⑥,作者认为《学灯》编辑群培植了一批新诗界的明星,继而营造了江南新诗研究中心,为江南地区传承和建设新文学发挥了重大作用。应该说这样的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版,第271页。

② 冯并:《中国文艺副刊史》,华文出版社2001版,第193—200页(笔者注:《中国文艺副刊史》第五章第四节《邵力子与学灯》标题有误,邵力子是《民国日报》的主编)。

③ 姚福申、管志华:《中国报纸副刊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104页。

④ 王吉鹏、郭磊:《鲁迅与〈时事新报·学灯〉》,《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⑤ 吴静:《“学灯”编辑群在五四新诗传播中的贡献与意义》,《出版发行研究》,2012年第3期。

⑥ 吴静:《传承与建设:〈学灯〉编辑群与五四新文学》,《编辑之友》,2012年第6期。

评价还是公允的，特别是作者对编辑群的关注于我心有戚戚焉，虽然我们的论述中心、研究对象还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此外，还有从社会历史学的角度进行探讨，如彭鹏的《研究系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以1920年前后为中心》一书对《学灯》有专门一章进行论述，研究视角是把《学灯》纳入到研究系的文化机关刊物探讨，但由于学科不同，作者对《学灯》的论述主要着重于历史、文化方面。^①

港台研究现状：

张朋园的《梁启超与民国政治》是一部在海内外有影响力的论著，其中对民国报纸杂志受梁启超言论影响有所论及，并时有思想火花迸现，如在谈到《时事新报》以及《学灯》时，就简要地点明梁启超对其政治倾向的影响，指出“‘学灯’所主张的缓进路线”来自于梁启超的思想和言论。笔者认为这种评价较为客观和公允。

通过对《学灯》的学术史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对学界《学灯》的研究，各个学科目前都尚未有专著，只是在章节中可见一二，且集中在新闻学著作中，论述也较为笼统。目前可见，无论是现代文学还是新闻学和历史学方面的研究，对其探讨都还远远不够，应该说《学灯》的研究有着非常广阔的空间。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基本构架

《学灯》以传播五四新文化而著称，副刊上发表宣传新文化的文章不计其数，文学作品以不同的形式传达新文化思想，文化文本与文学文本交织为一体，可以这样认为，《学灯》所具有的文化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它的文学意义。

《学灯》这种文化特质与新文化运动初期副刊文化的现状有很大关系。孙伏园在《京报副刊》创刊号上发表《理想中的日报附张》一文中就讲道：“而在中国，杂志又如此之少，专门杂志更少了，日报的附张于是又须代替一部分杂志的工作。例如宗教、哲学、科学、文学、美术等，本来都应该有专门杂志的，而现在《民国日报》的《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北京《晨报》的副刊，大抵是兼收并蓄的。”^②宗白华在1920年1月22日《学灯》发表的《我对于新杂志界的希望》一文中也说：“我们把新出版的杂志看看，总觉得千篇一律，内容相同，体裁相同，很难寻着有特殊的精神，特殊的目的，发挥一种专科的学术或研究一种特殊

① 彭鹏：《研究系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以1920年前后为中心》，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214页。

② 孙伏园：“理想中的日报附张”，《京报》，1924年12月5日。

的主义,解决一种单个的问题,对于社会有一种特别的贡献的。”他又补充说,“这种现象在新文化运动的初期,当然是不能免的。”^①

可见,《学灯》作为现代传媒不仅存在一个原生态的文学生长的过程,其对于中国现代社会以及文化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学灯》的价值进行重估,而重估的学术平台是中层理论。

中层理论亦称中观理论(theories of the middle range),“在社会学中原则上被应用于指导经验性调查,同时也是描述社会行为组织与变化和非总体性细节描述之间的中间物”^②,中层理论的创始者为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人和结构功能主义流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罗伯特·K·默顿(Robert King Merton)。社会学自诞生以来,就有一个远大目标,即总是把总体化、普遍化的宏大叙事作为自己的理论诉求。对此,默顿却持批判态度,因此他提倡的中层理论,旨在要“急需建立与阐释‘统一性理论’不同的框架”^③,统一性理论强调对‘社会学式理论的整体系统’的研究,而默顿强调中层理论是介于抽象的统一性理论和具体的经验性描述两者之间的研究,其基本特征有:“第一,它主要用于指导经验研究,且根据这一理论是可以通过经验加以验证的,如社会流动理论、社会分层理论、角色冲突理论、参照群体理论,等等。第二,它只涉及有限的社会现象,一般由几组有限的假定组成,且通过逻辑推导可以从这些假定中产生出能够接受经验调查证实的具体假设。第三,它能区分出微观社会学问题与宏观社会学问题,从而划清微观与宏观问题的界限。”^④经过40多年来社会学界的不断努力,中层理论已经突破了原来的政治学框架,延伸到不同领域。

西方学界运用“中层理论”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诸多问题进行解析,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已积累了不少成果,而国内的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前景可期,比如杨念群先生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⑤,就是“想在各种区域话语网络与相关的知识群体行为之间,建立起一种合理的解释关系,并试图用‘儒学地域化’这个中层概念对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加以涵括”^⑥。

① 宗白华:“我对于新杂志界的希望”,《学灯》,1920年1月22日。

② 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页。

③ 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页。

④ [美]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唐少杰、齐心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

⑤ 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⑥ 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11页。

杨念群先生运用的是“儒学地域化”的中层概念，我们在学术上似可把它浓缩成“地缘”^①两个字。地缘的功能不但见之于历史地理学，在文学领域也有其学术贡献。比如，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报刊的社会传播作用功不可没，而“地缘”在文化的集结过程中值得特别关注。陈万雄先生在调查《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及其作者构成时，发现了一个特别现象：《青年杂志》首卷作者有名有号可考者近二十人，只有谢无量和易白沙非皖籍，但亦与皖籍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谢无量父亲历任安徽县县长，其本人在安徽公学任教，与安徽知识分子熟稔；易白沙虽本籍湖南，却长期居皖从事教育和革命工作，与皖政界和文化界关系极密。^②

不过，在《学灯》里“地缘”的空间情形并不十分突出，只是主编群体的“人缘”结构特别鲜明。^③我们先了解一下《学灯》的主编人员。《学灯》的主编人员从1918年3月至1923年8月这个时间段前后共有8位。《学灯》最初由张东荪负责，后因事务繁忙，1919年2月4日，由匡僧编辑。两个多月后，匡僧因患脑病于1919年4月24日在《学灯》发表声明辞职。此后《学灯》由留学日本刚回国不久的俞颂华主持，正当俞颂华编辑《学灯》兴致甚高时，他的岳父未征询他的意见，就把他推荐给常驻海参崴的中国驻苏俄特使李家鳌做日文秘书。俞颂华不好违背岳父的好意，只好辞去《学灯》编辑，在1919年7月26日的《学灯》上登载启事声称：“鄙人因神经衰弱是以自今日始离馆休息，此后本栏编辑事宜由

① 笔者注：地缘是五缘文化之一。五缘是指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其中，亲缘(Kinship)，是以亲属为纽带而形成的宗族、亲戚关系，它包括了血亲、姻亲和拟亲(或称契亲，如金兰结义等)；地缘(Geographical relationship)，是以郡望、籍贯、乡土为纽带的邻里乡党等关系，俗称“同相”、“乡亲”；神缘(Religious relationship)，是以宗教信仰为纽带而形成的人际关系，如对关羽、诸葛亮、妈祖等的信仰，共奉的神祇结合着的人群；业缘(Business relationship)是以职业和学业为纽带的同学、同行之间的关系，有共同的利益和业务关系，有切磋和交流的需要和愿望，由此组合而成的人群，其组织形式便是同学会、学会、协会、研究会等；物缘(Product relationship)，是以物(如土、特、名、优等产品)为媒介、为纽带而集聚的人际关系，因物而集合的人群，也会出现诸如行会、协会、研究会之类的组织。以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为内涵的五缘，指的是以其为纽带结合成的社会人际关系，以社会结构和人际网络为主要对象，因此，从文化形态学的文化分层角度考察，五缘文化属于制度行为文化，是介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的中间层。五缘文化的主要载体是社会群体和社会团体组织。社群和社会团体组织处于个人与整个社会之间，起媒介作用。参见林其铨：《五缘文化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②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③ 笔者注：本书在这里的“人缘”结构更趋向于“业缘”。而之所以本书不用“业缘”的理由是：“业缘”更强调的是以职业在先，个人在后；职业决定个人，合则留，不合则去；而本书中的“人缘”则是以个人在先，职业在后，是先有共同的兴趣，共同的情感，共同的意志把大家组织起来。《学灯》的编辑群体也正是如此。所以用“人缘”的概念更为恰当。

虞君担任谨启。”虞君即郭虞裳，于1919年7月26日至1919年11月16日主持《学灯》，不久由宗白华协助共同编辑。1919年11月17日，郭虞裳离去，宗白华正式主持《学灯》。半年后，因宗白华去德国留学，1920年5月1日《学灯》由著名的哲学家李石岑主持。郑振铎1921年4月从北京铁路专科学校毕业分配到上海，进入《时事新报》馆，协助李石岑编辑《学灯》。1921年7月17日，李石岑辞职，郑振铎正式接手主编《学灯》。1922年1月31日，郑振铎因要编辑《儿童世界》，辞去《学灯》主编。1922年2月1日开始《学灯》由柯一岑主编，1923年8月底柯一岑赴法国留学^①，故编辑《学灯》到1923年8月底为止。此后至1925年11月，《学灯》的编者不明，没有启事告知，目前可以查证的是徐六几^②和郭梦良^③曾经主持过《学灯》。

《学灯》主编群体的“人缘”结构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时事新报》是研究系的机关报，所用之人当然要考虑研究系的人文背景。《学灯》首任主编张东荪就是研究系的重要核心成员。第二，即便没有研究系之背景，也要有共同的旨趣。各任主编中，张东荪、俞颂华、宗白华、李石岑、柯一岑等编者，都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古人云，道不同不相为谋。《学灯》主编存在着浓厚的“共喻文化”现象。^④第三，作为研究系的机关报，《学灯》的政治色彩是最淡的一种，因此《学灯》主编之间的个人关系就显得颇为重要，特别是与核心层《时事新报》主笔张东荪的亲疏、远近关系。恽代英在1919年6月25日的日记中，记其读报情形写道：“阅《时事新报》，亦复如《申报》，此真进步也。均超迈《时报》。”^⑤1920年7月6日，《学灯》“通讯”一栏刊登一封读者致张东荪的信，信中写道：“我并非谄媚

① 笔者注：1923年9月3日，《时事新报·文学》第86期，文学研究会会员消息，柯一岑君于八月三十一日乘 Paucal 邮船赴法国留学，通讯处未定。由此判断，柯一岑在1923年9月辞去《学灯》编辑。

② 笔者注：1924年5月15日《学灯》编辑室通知：“徐六几先生来编学灯了”，可判断为徐六几为《学灯》编辑。

③ 参见《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上册第271页，“此后‘学灯’的编者不明，只知道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徐六几和郭梦良都曾担任过。”又经笔者查证1925年1月27日《学灯》“通讯”一栏显示由郭梦良担任记者，故可判断为郭梦良担任《学灯》编辑。

④ 笔者注：著名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巴米德曾说过，人类发展的历史将经历三种文化。第一种是前喻文化，即后代人必须向老年人学习才能生存。所以，在这种文化里，老年人的经验特别重要，老年人也特别有权威；第二种文化是共喻文化，即两代人互相学习能生存和发展。第三种文化是后喻文化，老一代人则需要向年轻一代学习，社会才能进步。

⑤ 中央档案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编：《恽代英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568页。

先生，但我确信先生至少于一年前已经真正觉悟，已经超脱党派。现在的《时事新报》是一个证据。”应该说，《时事新报》当时的新气象之所以给青年以深刻的印象，主要是表现在《学灯》中的。《时事新报》采取主笔制，即由主笔综揽言论、编辑大权，包括方针、计划和各项设施以及人员进退。故而对于《学灯》主编的人员选定，《时事新报》主笔张东荪起决定作用。比如俞颂华、郭虞裳都是张东荪的好友，便是应《时事新报》主笔张东荪之邀，担任《学灯》主编。个别者，如郑振铎是因为被张东荪所赏识而进入《学灯》。柯一岑在担任《学灯》主编前，一直是《时事新报》副刊《余载》^①和《青光》^②的编辑。

这些主编，除了具有编辑人员的身份之外，还是具有强烈社会历史使命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学灯》主编尽管有着由于各自不同的出身背景、生活阅历和心路历程所造成的个别差异，但却有着明显的共同点，即他们是一群这样的知识分子——“具有一种激情，要将他们时代最好的知识、最好的思想从社会的一端传播、搬运到社会的另一端，使之流行不衰”。^③可见，传播新文化是各位主编的“公约数”。正因如此，《学灯》创办者张东荪在发刊词中所宣称的“灌输文化”之宗旨，为后任的主编所执着追求和贯彻遵循。

但是也正如陈平原先生所说：“著名的文人学者办杂志、编副刊，不同于职业编辑，在于其有明确的立场与趣味，其选择去取，即使无心，也都大有深意。”^④因此，《学灯》主编群体在传播新文化的大旗下，同时也根据自己的趣味与立场对《学灯》进行内容定位，并各取所需、自行裁夺，享有很大的处置权利。当然，也不排除《时事新报》管理层对他们的控制与约束也十分松散之原因，比如，俞颂华任主编期间，即停办“佛门丛载”栏目，同时发起关于“社会主义”征文。而宗白华一从助理升任主编，就断然取消了“新文艺”而代之以“新诗”，竟破例用《学灯》的大半个版面推出郭沫若的诗作。许多年以后，郭沫若以充满感激的心情说：“但使我的创作欲爆发了的，我应该感谢一位朋友，编辑《学灯》的宗白华先生”^⑤，并称宗白华是他的“钟子期”。郑振铎主持期间，致力于将《学灯》打造成一个文学研究会的同人刊物。

《学灯》主编群体的形成，既烙上了中国社会剧烈变迁的时代色彩，又有着

① 关于《时事新报》副刊《余载》的介绍，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

② 同上。

③ Matthew Arnold, Culture and Anarc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70.

④ 陈平原：《文学的周边》，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页。

⑤ 郭沫若：《创造十年》，现代书局1932年版，第78页。